

# 马克思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继承和修正

## ——基于现象学的视角

刘少明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433)

**摘要:** 笛卡尔认为物的本质是广延, 灵魂的本质是思维, 因此物相对于思维来说具有超越性。但是, 天赋观念可以把握物的广延, 使得物可以被认识, 所以物是超越性与可认识性的统一。马克思基于现象学式的感性活动理论, 继承并修正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第一, 笛卡尔的物性理论包含心物异质性和心物一致性的矛盾, 马克思则在将心物异质性和一致性放在感性活动的基础上进行了构建, 消除了二者的冲突。第二, 笛卡尔的物性理论依赖信仰的外在统一, 陷入了无限后退的困境。马克思在现象学式的感性活动的内在性统一中揭示了信仰的发生机制, 消除了外在统一的无限回退困境。第三, 笛卡尔的物性理论是静态化的抽象统一。马克思将这种统一放置到生存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语境中进行阐释, 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变得更加具体化和立体化。研究马克思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继承和修正, 对认识笛卡尔和马克思的物性理论及其关联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物性理论; 超越性; 可认识性; 笛卡尔; 马克思

**中图分类号:** B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5)01-0023-10

笛卡尔被认为是近代哲学之父, 是心物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和天赋观念论的重要代表。马克思则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开创者, 他反对心物二元论、身心二元论和天赋观念论。因此, 马克思与笛卡尔之间从表面上看是对立的。但是, 在物性理论方面, 马克思与笛卡尔有着极大的关联。对于马克思与笛卡尔物性理论的关联的研究, 已有成果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阐述马克思与笛卡尔开创的近代主体性哲学的关联, 比如员俊雅认为马克思继承和超越了笛卡尔的主体性哲学, “马克思哲学的主体性思想, 以人的生产劳动为出发点和本体论基础, 重构了丰富的主体性, 克服了传统主体性形而上学的种种困境”<sup>[1]</sup>。二是说明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哲学实现了对笛卡尔主观唯心主义理论的超越。张光成认为笛卡尔式的“主体能动思想与认识论中心的观念就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得到了扬弃与新生”<sup>[2]</sup>。但是, 既有成果没有从物的超越性与可认识性统一的角度, 阐述马克思对笛卡尔的物性理论的继承和修正。本文认为, 马克思的物性理论从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角度继承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但是, 马克思理论中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建立在感性活动之上, 类似于建立在现象学的“事物本身”之上, 从而超越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马克思超越了笛卡尔广延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内在矛盾、信仰基础和抽象特质。研究马克思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继承和修正, 能够凸显笛卡尔和马克思在物性理论上的差异、贡献和思想史上的关联。

**收稿日期:** 2024-07-12; **修回日期:** 2024-09-08

**基金项目:**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项目“上海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专项”: “中国共产党百年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经验及其现实启示研究”(2023ZSS004)

**作者简介:** 刘少明, 男, 重庆人, 哲学博士, 复旦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哲学、现象学、时间哲学, 联系邮箱: liushaoming@fudan.edu.cn

## 一、双重物性的统一：马克思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继承

笛卡尔认为，“在我仅仅想到物体是一个有广延的、有形状的、可动的、等等的东西时，我完整地领会什么是物体”<sup>[3](129)</sup>，因此广延、形状、运动等属性是物体的基本属性。但是，笛卡尔认为物相对于人的灵魂来说具有超越性，并且认为人的思维可以认识物的本质属性，因此，广延之物包含超越性与可认识性两种属性。笛卡尔以主体性的反思作为哲学的思考起点，因此物表现为外在的超越性对象。可认识性则说明了人可以把握外在之物的真实面目，它是物的超越性在认识论上的必然要求。但是，后世认为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是神学式的外在统一，没有完成二者逻辑上的内在统一。笛卡尔的这种思维方式，被经验论者、理性论者所继承。但是休谟认为经验论者和理性论者在此问题上都会陷入怀疑论，即不能保证自己的认识是对外在物体的真正把握。康德哲学承接了这种思维方式，他在主体先验认识形式的范围内，试图说明物的超越性不影响物的可认识性，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物的认识的可能性问题。但是康德没有解决物的可认识性问题，因为先验认识形式使得物的超越性变成了“物自体”，人对物的认识始终是有限的，所以康德没有真正实现笛卡尔哲学的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理想。黑格尔试图将超越性消解在主体的历史性中，但他消解了人和物的时间性，人只能在虚假的历史性的终点——绝对精神中假装实现人对物的认识。因此，黑格尔没有实现人对物的把握，也没有完成笛卡尔的理想。马克思继承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试图将物的本体论存在与对物的认识统一起来。马克思作为实践唯物主义理论的开创者，认为物相对于人来说始终保持着超越性，同时物的属性是可以被人所认识的。马克思的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继承了笛卡尔开创的主体性哲学思路，下面将从两个方面进行阐述。

### (一) 笛卡尔理论中物的超越性与可认识性的统一

笛卡尔认为，物相对于灵魂来说既是超越的，也是可认识的。在讨论物的超越性之前，首先要确定什么是超越性要超越的对象？笛卡尔认为物的超越性要超越的是人的灵魂和身体，因此物的超越性表现为两个方面。第一，物的超越性是相对于灵魂的超越性来说的。笛卡尔通过普遍化的怀疑，说明了我思的实在性。他认为：“就是因为我确实认识到我存在，同时除了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之外，我又看不出有什么别的东西必然属于我的本性或属于我的本质，所以我确实有把握断言我的本质就在于我是一个在思维的东西，或者就在于我是一个实体，这个实体的全部本质或本性就是思维。”<sup>[3](85)</sup>在这里，笛卡尔将“我”当作了一个思维的主体，也就是灵魂。灵魂的本质包括理性思维，即推理、肯定、否定等能力，也包括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能力。作为思维的实体，物在两个层面上是超越灵魂的。其一，作为广延之物的身体，它是超越灵魂的。灵魂是可以脱离肉体而存在的，“精神可以不依靠大脑而行动，因为，毫无疑问，当问题在于做成一种纯智力活动时，大脑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在感觉或者想象什么东西的时候，它才有用处”<sup>[3](367)</sup>。灵魂之所以可以脱离大脑和其他肉体而存在，是因为“精神的全部本质或全部本性就在于思维，而身体的全部本性就在于身体是有一种广延性的东西，而思维与广延，二者毫无共同之处”<sup>[3](367)</sup>。思维与广延的不同之处突出表现在“肉体永远是可分的，而精神完全是不可分的”<sup>[3](93)</sup>。所以，灵魂的不可分性与独立性，证明了灵魂外在于或超越于作为广延之物的身体。其二，灵魂超越非身体的一般广延物。笛卡尔通过广延性来定义一般物体的本质。在他看来，人对物的感觉并不是物本身，而是物对人的身体的机械作用，身体并没有对物的本质进行真实反映。广延就是表现在量上的空间几何特性，它包含空间的三个维度。因此，一般广延物相对于灵魂的超越性就如身体相对于灵魂的超越性一样，一般广延物与灵魂性质的不同决定了物的超越性。第二，身体超越其他一般广延物。笛卡尔认为身体不过是一台遵循机械作用的机器，外物能够刺激它，使得

精神产生一种感觉。从感觉产生的源头来看，一般广延物是外在于身体的，当物作用于身体时精神就会产生感觉，不作用于身体时精神就不会产生相应的感觉。同时，身体与灵魂紧密结合在一起，“我在身体的部分上，而不是在跟它分得很开的别的物体的部分上感受到愉快和痛苦”<sup>[3](83)</sup>，因此物与灵魂的紧密程度低于身体与灵魂的紧密程度。同时，当胃产生饿的感觉、灵魂想要吃饭的时候，胃本身不能满足感觉的需求，只有外部的食物才能消除饿的感觉，因此物必然也是超越身体的。所以笛卡尔认为，“物质事物的观念不能是由我产生的，因为我没有产生这些观念的功能”<sup>[4]</sup>，因而物是超越人的。

但是，物相对于人的超越性也为人的感觉认识物的本质设置了障碍。超越之物虽然能对身体产生机械作用，并且最终在灵魂中产生“感觉”，但是机械作用产生的感觉却不是对物的模仿。其一，感觉是精神中的感觉，它与物本身有差别。比如，“当脚上的神经比平时更强烈地动起来的时候，这些神经的运动经过脊椎一直到大脑，在大脑那里给精神一种印象使它感觉到什么东西，比如疼，比如在脚上，精神从疼上就知道了并且激动起来，尽可能驱除疼的东西，把这个原因当成是对于脚非常危险、非常有害的东西”<sup>[3](95)</sup>。但是，这里的感觉将物显现为有害的，却并没有展现“物的本质”。笛卡尔认定物的本质就是广延，“有害的”作为与人的情感与价值相关的属性，对笛卡尔来说不是物本身。其二，感觉是有可能出错的，因此感觉对物的判断也会出现错误。比如水肿病人感觉喉咙干燥，但是喝水反而会害了他。或者有毒的事物有可能闻起来是很香的。因此，感觉到的物的功用也会出现错误。其三，精神与身体的联结并不是一种机械的联结，二者之间的关系很难说清楚。如果灵魂或者精神以思维的方式存在，而身体和一般广延物以机械运动的方式存在，那么二者的联结方式就始终存在问题。虽然笛卡尔找到了身体“与心灵相互作用的位置——松果体”<sup>[5]</sup>，但是松果体作为一个广延之物，它内在联结心灵与身体的方式仍然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因此，笛卡尔哲学中物的可认识性的障碍在于身体与外在物体作用引起的感觉不能把握外在物体的本质。

但是，笛卡尔认为心灵或者灵魂能够直接认识外物。超越之物的本质在于其广延性，因此“作为广延以及以广延为前提的偶性(如形状、位置、地点的运动等等)的直接主体，叫做物体”<sup>[3](167)</sup>。无论是物的广延，还是物的形状、位置、地点和运动，都是以量的方式存在的。心灵本身具有数学观念，且可以很好地运用数学方法进行推理，那么心灵就可以把握以量的形式存在的超越之物。因此，感觉对物的认识的无力，可以在广延性的量化计算中得到说明。因为“颜色、温度、质地、声音等等，只不过是物体(外在的物体和我们的身体)的这些量化属性所制造并被我们的心智以特定方式记录下来的复杂效果”<sup>[6]</sup>，所以，物的可认识性就在于灵魂具有数学观念，且物的本质就是广延化的数学量(集合或者代数的)，因而二者能够在本质上达成一致。数学观念或者清晰的观念都是通过天赋获得的，并且在直观中显现，“‘直观’之中‘思维’与‘对象’自然地符合在一起”<sup>[7]</sup>，因此人通过灵魂的直观可以达到对于超越之物的认识。

## (二) 马克思理论中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

笛卡尔关于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理论，在马克思的哲学中得到了传承。首先，马克思认为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超越性。第一，物的超越性表现为物的外在性。马克思认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自然界是工人的劳动得以实现、工人的劳动在其中活动、工人的劳动从中生产出和借以生产出产品的材料”<sup>[8](48)</sup>，作为自然界的组成部分的物相对于人来说是外在的。这种外在性主要表现为物对于人来说的条件性，人的活动需要物作为材料才得以可能，否则活动就是空的活动。第二，物的超越性表现为物相对于人的不同。马克思认为，人在进行活动的时候，“外部自然界的优先地位仍然会保持着”<sup>[9](157)</sup>，这种优先地位证明了外部世界和物的超越性。物相对于人的优先地位，“只有在人被看做是某种与自然界不同的东西时才有意义”<sup>[9](157)</sup>。人与物的不同并不在于人与物的某一个具体特性不同，而在于物包含着人的活动成果中没有的潜在异质性。潜在异质性是物相对于人的多重可能性，因为随着人类活动的变化，物会展现出不同的样态和属性。第

三,物的超越性表现为人的受动性。“人作为自然的、肉体的、感性的、对象性的存在物,同动植物一样,是受动的、受制约的和受限制的存在物。”<sup>[8](103)</sup>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独立性,不受人的控制且能影响人,所以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超越性。

其次,马克思认为物的超越性并不妨碍物的可认识性。物的可认识性意味着人能够在认识上把握物的本质。马克思通过两个方式论证了这一点。第一,物的可认识性来源于实践对主客观界限的跨越。

“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gegenständliche]真理,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即自己思维的现实性和力量,自己思维的此岸性。”<sup>[9](134)</sup>物的超越性可以在实践中被克服,因为思维正确与否,可以在物的实践活动之中展现出来,物的本质也可以在实践活动中转化成人思维认知。因此,马克思认为思维在实践中具有客观性,物的超越性也在实践中被拉回到思维的此岸,“思维和存在虽有区别,但同时彼此又处于统一中”<sup>[8](81)</sup>。第二,物的本质的显现是通过人的对象化能力完成的,人在思维中能够把握作为自身能力显现范围之内的物。马克思认为:“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sup>[8](83)</sup>物的感性特质表现的是主体的感性能力对物的把握,物的广延特质表现的是主体的思维能力对物的把握,物的超越性也只能在这一主体范围之中被把握。因此,人在物之中肯定的是自己的思维和感性能力,物也在这种肯定中被认知。马克思在肯定物相对于人的超越性的同时,也认为物可以在认识活动中被把握。

## 二、统一方式的变革:马克思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三重修正

尽管马克思继承了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理论,但是他也对笛卡尔的理论进行了修正。首先,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包含超越的异质性和可认识的同质性之间的矛盾,马克思通过现象学式的感性活动理论解决了这一矛盾。其次,笛卡尔以神学的方式实现了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马克思则将这种统一还原到现象学式的感性活动之中,实现了从信仰化的外在统一到现象学式的内在统一的转化。最后,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较为静态化,马克思则将这种统一纳入人的生存和社会历史的视域中,将这种统一变得更加立体化。

### (一) 马克思对笛卡尔理论中心物异质性与心物同质性矛盾的解决

笛卡尔认为,虽然物相对于人的灵魂和身体来说具有超越性,但是物的超越性不妨碍人的思维对它的认识。笛卡尔的这种统一有一个矛盾:外在的异质性和认识的同质性的矛盾。外在的异质性指的是物相对于人的灵魂的异质性(笛卡尔认为物与身体在本质上是同质的),因为人的灵魂本质上是思维,而物的本质是广延。但是,假如思维能够认识广延,思维与广延又实现了同质性。尽管这种同质性并不意味着二者在存在样态上达到了同一,但是却说明了二者在内容上的一致性,即思维的逻辑特征和计算特征符合物的广延存在样态。笛卡尔认为思维与广延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二者在时空层面具有异质性,也是相互独立的。思维对量的推演的合理性与物的广延性之间的类似性,并不代表思维具有时空特性,也不代表物与思维不再是相互独立的。因此,一方面,假如坚持物相对于思维的时空异质化的超越性,或者坚持思维相对于物来说的思维独立性,那么物的可认识性就是不彻底的;另一方面,如果坚持物的可认识性,那么物对于思维的时空异质性和思维对物的独立性就是不存在的,超越性也就被消解了。因此,笛卡尔哲学中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并没有彻底实现统一,两种物性之间反而存在矛盾。要解决这个矛盾,需要说明时空特性对于思维来说并不是异质性的,也需要说明思维属性对于物来说也并不具有独立性,还需要说明物在保持与思维的同质性的情况下仍然具有相对于思维的超越性。马克思通过将感性实践活动当作现象学式的事物本身,实现了对笛卡尔物性理论的修正。

第一，马克思认为，物的时空特征对于思维来说并不是异质性的，主体反而是物的时空特性的显现条件。笛卡尔在“‘我的本性’这一非时间性的认识原点上，建立知识的基础”<sup>[10]</sup>，就是在非空间的“我思”的基础上建立知识的基础。在笛卡尔之后，康德其实已经试图将时空特征主观化，并试图在时空范围内论证人的认知的可能。马克思延续了康德的这一思路，将物的时空特征奠基在人的活动之上，说明思维能够把握物的时空。马克思认为，物的时空并不是独立于人的思维时空的，而是在人的实践活动中被认识和构造的一种时空。“如果没有工业和商业，哪里会有自然科学呢？”<sup>[9](157)</sup>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代表了人类理性的自然科学及其对物的时空的把握，都是人的感性实践活动的结果。感性实践活动作为人与物相互作用的过程，是一种原初的时间，是让物显现的原初时间；感性实践活动也不断塑造物的空间形态，甚至打开了自然的边界。所以，物的时空表现并不专属于物，它与人的时空观念是统一的，而且这种统一有其实践活动的基础。思维与物的时空统一性，弥补了笛卡尔理论中时空属性对于思维和物的隔绝，为认识的可能奠定了基础。

第二，马克思认为，思维与物的关系并不像笛卡尔描述的那样是相互独立的关系，而是辩证的对象性关系。思维与物的原初时空属性，已经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思维与物并不是相互独立的。当然，马克思对思维与物的原初统一性的证明，主要体现在对物与人的感性活动性质的论证上。马克思认为：“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因此，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中肯定自己”<sup>[8](83)</sup>。马克思证明了，物的显现是在人的感觉能力范围内的显现，物的本质也是人的感觉所表达的本质。笛卡尔认为感觉不能表现物的本质，因为它仅仅是物机械地作用于人的身体，仅仅是物在思维中的某种表象而已。但是，马克思认为感性恰恰表达了对象的本质，因为对象的显现是通过感性来完成的，没有超越感觉的对象的本质的。不仅如此，思维是在物的感性显现基础上的思维，或者二者本身就是不可分的，“感觉在自己的实践中直接成为理论家”<sup>[8](82)</sup>。所以物并不独立于思维，感觉与思维之间也没有分离，思维只有以理论的方式和感觉结合在一起才显现了物的本质。在此意义上，物的本质并不是彻底独立于人的思维和认识的，物是人的感性活动中思维所把握的那个物，物在其本质上是可认识的。

第三，马克思阐述了人与物在时空特性上的统一，在消除了人与物之间的独立性的基础上，仍然证明了物相对于人来说具有超越性，从而彻底解决了笛卡尔物性理论中的矛盾。马克思认为物的时空特征奠基在感性活动之上，物的感性本质也来源于人的感性活动，因此物是可认识的。但是，这种可认识性并没有将人的心灵当作自然之境，不是一种消极的反映论。马克思仍然承认了物的超越性，只不过这种超越性不再是笛卡尔意义上的纯粹的异质性，而是在统一时空中的“他者性”。作为感性时空活动中的他者，物被当作改造对象、需求对象、认识对象，它的超越性是在感性时空活动中被把握到的。其一，物的超越性意味着人不能在当下直接获得，而是需要通过感性活动来实现改造、需求和认识获得的。其二，物的超越性意味着人的实践活动能力的改变会带来对物的新的认识。当然，新的认识并不意味着物包含着不可认识性，而只是包含“尚未”被认识的方面与新的思维角度，人对物的认识将在时间中被不断刷新。因此，感性活动的时空又为物的超越性的显现提供了基础。所以，感性活动塑造的时空和对物的感性的把握，实现了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更深刻的统一，解决了笛卡尔哲学中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内在矛盾。

## （二）马克思将笛卡尔的物的双重性质的外在统一推进到现象学式的内在统一

笛卡尔认为，虽然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可以从观念中得到说明，但是不是从认识内部得到说明，因为二者最终的保证来自上帝。第一，物的超越性的最终保障在于上帝。灵魂与物的异质性，身体与物的异质性，如何能保证物对于人的超越性呢？如果物总是超越于人的灵魂的，那么人是如何知道物

的本质就是广延性的呢?从根本上来说,广延与思维之间的差别也许只是思维的内在观念,因此笛卡尔没有办法从观念中内在地证明广延之物超越于灵魂和身体。但是,“既然上帝不是骗子,那么显然他不会自己直接地,也不会通过什么造物的媒介(在这个造物里并不是形式地,而仅仅是卓越地包含观念的实在性)把这些东西的观念送给我……因此必须承认有物体性的东西存在”<sup>[3](87)</sup>,所以不欺骗的上帝保证了物的超越性。这说明物并不仅仅是一种主体的内在观念而已。第二,物的可认识性的最终保障也是上帝。人对物的数学化认知与超越之物的一致性如何能够得到保障呢?笛卡尔也承认:“一切知识的可靠性和真实性都取决于对于真实的上帝这个唯一的认识,因而在我认识上帝以前,我是不能完满知道其他事物的。”<sup>[3](78)</sup>笛卡尔认为物的本性在于广延,人也具有天赋的数学知识把握量化的广延,但这两方面的前提的可靠性都来源于上帝。认识到上帝的存在之后,人就“取得属于物体性质的那些东西的知识,因为物体性质可以用做几何学家们推证的对象”<sup>[3](78)</sup>。因此,笛卡尔论证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方式,在本质上是外在的方式。物相对于人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之间的统一不是依靠人自身完成的,而是通过外在于灵魂和物的上帝来得以保障的。在此问题上,马克思的感性实践活动理论,一方面从内在化的角度解决了用上帝证明物的超越性的非必然性的问题,另一方面弥补了从上帝出发论证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外在性的缺陷,实现了对笛卡尔的物的双重性质统一的理论的修正。

第一,马克思从感性活动出发解决了笛卡尔物性理论的非必然性和不充分性的问题。笛卡尔从信仰出发来证明超越性上帝的存在,进而论证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方式,并没有逻辑上的必然性。笛卡尔以信仰为预设,证明上帝的超越性存在的方式有两种。其一,笛卡尔理论中的上帝在直观自明性中被证明,“我们可以说,知识上有两种自明性,一种是对数学知识的直观认知所具有的自明性,一种是对上帝的认知的自明性。两者的区别在于:数学知识与我的本质特征具有和谐性、一致性,而关于上帝的认知的自明性至少和数学真理的确定性是一样的”<sup>[11]</sup>。但是,假如直观认知的自明性和数学的自明性是一样的,就意味着直观性的认知既可以达到对知识的把握,也可以达到对上帝的超越性存在的把握。这意味着直观认知包含对超越性存在的把握能力。但是,笛卡尔认为思维与超越性的存在始终是不一样的,二者之间有着质的差别。如果直观本身就可以把握“超越性”,而且直观自身也具有认知的真理性,它就不再需要上帝来保障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这显然与笛卡尔的理论相矛盾。他在理论矛盾的情况下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预设了对上帝的信仰。其二,上帝的本体论证明。笛卡尔说:“我是一个有限的东西,因而我不能有一个无限的实体的观念,假如不是一个什么真正无限的实体把这个观念放在我心里的话。”<sup>[3](49)</sup>笛卡尔的证明借用了安瑟尔谟的上帝的本体论证明,但这种证明并不具有必然性。回到笛卡尔一开始的怀疑,所有的观念有可能是假的,或者是由其他非无限的原因被放置在我的脑海里的。可以看出,“笛卡尔提出的关于上帝存在的证明,不论是从我信中存在上帝观念出发、从我存在出发还是从上帝的本性或概念出发,他提出的论证都预设一些未经证明的公理、原则作为论证前提”<sup>[12]</sup>。笛卡尔之所以在论证不充分的情况下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仍然从信仰出发证明上帝的存在。

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解决了笛卡尔用信仰上帝的方式来保障物的双重性质的非必然性和不充分性的问题。“关于思维——离开实践的思维——的现实性或非现实性的争论,是一个纯粹经院哲学的问题”<sup>[9](134)</sup>。在马克思看来,观念本身是在实践活动中诞生的,“上帝”作为宗教的意识和观念,是特定实践活动的产物。“凡是把理论诱入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活动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sup>[9](139-140)</sup>,因此作为超越人的存在和认知的上帝观念,可以从人的实践活动出发进行解释。上帝观念产生的原因有多种,自然崇拜和社会剥削都是其产生和发展的原因。因此,笛卡尔关于上帝的包含超越性存在内涵的理论,被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及其衍生出的意识形态理论所否定。在此意义上,笛卡尔理论中的上帝作为直观或推理的观念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

并不必有必然具有超越性存在的内涵，不能作为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可靠保障。

第二，马克思运用感性活动理论，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进行了内在化证明，解决了笛卡尔以超越性的上帝来解释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问题。对于物相对于灵魂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首先要解决上帝与灵魂、上帝与物的关系问题，为上帝与物、灵魂的双重统一提供基础。关于物的超越性的问题，笛卡尔认为“用上帝这个名称，我是指一个无限的、永恒的、常住不变的、不依存于别的东西的、至上明智的、无所不能的以及我自己和其他一切东西(假如真有东西存在的话)由之而被创造和产生的实体说的”<sup>[3](49)</sup>。因此，物和灵魂都是上帝创造的，而且这种创造不是一次性完成的，而是具有时间上的持续性。笛卡尔认为，物的持续存在意味着物被上帝持续创造，灵魂的保存也是因为上帝的持续创造。物相对于人的超越性归因于上帝的持续创造。在物的可认识性问题上，因为上帝是不会欺骗我的，上帝让我的观念能够把握物的本质。但是，因为上帝是相对于灵魂和物之外的实体，所以上帝对于物和灵魂的双重关系的保障始终是外在的。上帝的持续创造和上帝的“不欺骗”在这里也需要被证明，从而就陷入不断后退的证明困境之中。同时，马克思认为“既然你提出自然界和人的创造问题，你也就把人和自然界抽象掉了”<sup>[8](89)</sup>，脱离感性活动证明的自然界的创造问题也是一个抽象的证明。所以，将上帝当作一个中介，并用中介的方式来证明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方法，会遇到无限后退和抽象证明的问题。

感性活动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证明是内在性的，它规避了外在性证明的无限后退和抽象证明的困境。马克思在思维方式上经历了一个现象学式的转变，他试图悬置抽象的人和物的实体预设，把物和人都还原到非抽象的原初活动上进行显现和构造。通过现象学还原，马克思认为“感性活动与感性世界实际上是一体的，感性世界实际上是在自身之中显现自身的”<sup>[13]</sup>。因此，物和人的内在性的根源在于感性活动及其构造。在此意义上，物的超越性是内在的超越性，即物的超越性是在感性实践活动中表现出的无限潜能、偶然性、不协调性等特性，这一超越性仍然是在感性活动之内发生和显现的。同样，物的可认识性表现在感性实践活动的内在协调性、过去与当下的一致性等特征，它们也是在感性活动内部显现的。内在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问题，规避了笛卡尔在用抽象上帝对人和物的双重关系保障时面临的无限后退证明的困境，也从具体的感性活动中消除了抽象阐述的困难。

### (三) 马克思将笛卡尔的物的双重性质的抽象统一推进到具体统一

笛卡尔认为，物的超越性是广延实体对思维实体的超越，物的可认识性也是思维实体对广延实体的量化、几何化的把握。在笛卡尔的理论中，物的这两重性质的统一是在反思性的思维活动中被把握的，这种统一具有抽象的性质。其一，抽象的理论思维对物的双重性质的统一，忽视了物的生存论内涵，对物的超越性与可认识性的认识具有片面性。其二，笛卡尔对物的双重性质的统一是一种静态化的统一，因为缺乏历史性而陷入了固化的理论中。其三，笛卡尔的物性理论缺乏对物的社会性考察，使得对物的双重性质的统一缺乏社会性基础。马克思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是动态的、社会化的、并且包含生存论的认识，克服了笛卡尔对物的双重性质统一的抽象性。

第一，马克思将物的生存论的特征展示为反思性理论认知的基础，解决了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理论的抽象性问题。笛卡尔认为，物的超越性是物的广延性相对于灵魂的思维特性的差异，物“剩下的只有广延的、有伸缩性的、可以变动的东西”<sup>[3](32)</sup>。物的感性特征不能说明物的超越性，因为感性只是身体与物的机械关系。因此，物的可认识性也仅仅是灵魂对于物的广延的认识。但是，这种说法忽略了物的广延性的显现都有其感性的基础，脱离感觉的广延的物或认知仅仅是一种抽象的认识。广延是思维认识物的形式，而“形式化始终是回顾性的，这证明它从来都只在表面上是完整的，而且形式思维依靠直观思维”<sup>[14]</sup>。更进一步，任何感性也不是单纯的感觉，而是在人的生存活动中所显现的物的性质。在此意义上，笛卡尔反思性的物性理论忽略了其基础——人的生存活动。马克思从人的生存活动出发考虑物性问题，认为物首先作为吃穿住行的对象而存在，并且首先是在人的

生产活动中被显现的。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活动本身”<sup>[9](158)</sup>。这里的“第一个”说明了物的原初显现基础就是生存活动,因此,物的超越性首先表现为人的实践对象和需求对象,物的可认识性也首先是在可用性的意义上出现的。在生存对象的基础上,反思性的广延对象因进一步的反思和抽象而得到发展。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与海德格尔的思路是一样的,即反思性的主题化思维奠基基于原初的实践活动。实践活动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基础性揭示,修正了笛卡尔对物的双重性质统一理论的抽象性。

第二,马克思将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奠基在感性活动之上,阐明了物的这两种性质的发展性,修正了笛卡尔理论的非历史性和停滞性。马克思认为,广延与灵魂的差异仅仅是某一时代对于物的认知的差异,这种差异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比如,当代科学中的暗物质理论证明了物的存在的非广延性,但是人对于暗物质却可以进行把握。人可以通过暗物质对于物质的引力作用的变化推断出暗物质的特性。又比如,微观物质的广延性具有不确定性,“在作为万事万物之终极本原的亚原子粒子层面,事物的存在和关系不再像朴素的观点所理解的那样,以有独立身份的实在表现出来,而以既有界限又没有界限的形式存在着”<sup>[15](439)</sup>,这种不确定性也表现在量子的位置与动量的不可兼得。因此,笛卡尔理论中物质的广延性相对于人的思维的超越性是可以变化的,因为暗物质的广延性已经被排除,而且微观物质的广延性并不明确。同样,物的可认识性也不是思维对物的广延的把握,因为暗物质被认识的是引力特性而非广延特性,微观物质在广延性层面的可认识性也被科学所质疑。回到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仍然是存在的。因为暗物质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是从人对物质的感性观察和实验中推理出的。微观物质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也是在感性活动的意义上得来的。比如在“薛定谔之猫”例子中,“量子系统及其特征在被观测前就像箱子中的猫,即处在两种状态以上的叠加状态(即或者是死,或者是活)”<sup>[15](451)</sup>。但是,“只有当有实在的观察发生时,箱子的状态叠加才会‘坍塌’成一个单个的、确定的状态”<sup>[15](452)</sup>。“作为基本量子系统的物质世界要有其确定性是离不开有意识的观察者的”<sup>[15](452)</sup>,因此量子系统中猫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都是建立在人的感性观察和活动之上的。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应该具有其历史性和发展性。马克思的感性活动理论,承认了感性活动本身的历史性,认为感性能力、感性材料、感性工具都是发展着的,“工业是自然界对人,因而也是自然科学对人的现实的历史关系”<sup>[8](86)</sup>。所以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奠基基于人的感性活动,马克思克服了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统一的历史局限性。

第三,马克思把对物的属性考察推进到对物的社会生产关系的考察,突出了物的两种性质统一的社会性。笛卡尔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进行统一时,是从单个灵魂的角度出发的。笛卡尔通过怀疑展现了“我思”的实在性,在“我思”的基础上推断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但是,这种推断忽视了对人对物的把握不是单独进行的,而是有其社会背景的。其一,笛卡尔和奥都斯丁等西方哲学家都以怀疑的方式证明物的超越性。其二,笛卡尔对物的实体特征和可认识的把握,也具有西方文化的鲜明特质。其三,笛卡尔通过解析集合的方式对物的量化把握是建立在欧洲文明的数学思想基础之上的。因此,笛卡尔的推断虽然具有创造性的个性化特征,但是这种特征被文化传统所规定的概念和思维方式所限制。笛卡尔忽视了对人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把握的社会性背景。马克思认为,“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sup>[9](161)</sup>,对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把握具有社会教育的特征。而且,马克思还认为,“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sup>[8](79-80)</sup>。因此,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不是单个人的功劳,它只能在社会提供的制度、技术、文化和思维中实现。马克思不仅认识到了物的双重特质的统一有其社会基础,还认为这需要以社会的发展来实现,从而克服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中的“我思”证明的单子化和抽象性。

### 三、马克思继承和修正笛卡尔物性理论的意义

笛卡尔对于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的理论，一方面说明了心物之别，另一方面又说明了心物之同。这种划分将哲学奠基在主观性哲学之上，试图证明人能够把握超越之物的本质。马克思从方法上和理论内容上继承了笛卡尔的物性理论。第一，从思维方式看，马克思用人的感性活动为人、物和社会奠基，其基本思维仍然在笛卡尔开启的近代哲学传统之内，只不过二者对“主观性”的理解不一样。第二，从理论内容来看，马克思坚持了物的超越性，将物当作“对象”来看待，既反对离开人去认识物的抽象唯物主义和直观唯物主义，也反对离开超越性去谈论物的经验主义和唯心主义。这就为坚持唯物主义世界观奠定了基础。第三，马克思坚持了物的可认识性，认为物的特性可以在主体能力和对象属性相结合的意义上达到认识的真理。这也为反对不可知论或认识的怀疑论提供了理论基础。

但是，马克思将笛卡尔的人、物和上帝三大实体缩减为人的主体，实现了一种现象学式的改造。因此，马克思不同意笛卡尔将物的超越性阐述为思维与广延实体的差别，不同意将物的可认识性阐述为思维对物的广延性的把握，更不同意笛卡尔用上帝来解释思维和物的统一，而试图以感性活动来解释物的双重性质的统一。第一，马克思的实践活动开辟的时空和对物的感性的把握，实现了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更深刻的统一，解决了笛卡尔的心物之别与心物之同的矛盾。第二，笛卡尔对心物之别与心物之同进行了外在的信仰统一，但是用外在化的上帝保障人和物的双重关系时会陷入无限后退的困境。马克思则规避了这一困境，并且证明上帝的观念可以追溯到人的感性活动。第三，笛卡尔物性理论中物的双重性质统一具有非生存性、历史性、非社会性的特点，马克思将这种统一放置到生存性、社会性和历史性的语境中进行阐释。马克思对笛卡尔关于物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的统一理论的修正，说明了对物的认识需要建立在社会、历史、实践活动的基础上，不能陷入抽象的个人反思之中。同时，要反对抽象的超越性和可认识性概念，要将这些概念还原到具体的显现基础上进行重构。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用现象学式的显现方法，超越了理性主义提前设定主体和客体的理论，超越了对主客体的宗教式的统一的方法。对马克思继承和修正笛卡尔物性理论的研究，为坚持和展现对物的正确研究的方法具有重要意义。

#### 参考文献：

- [1] 员俊雅. 论马克思在主体性问题上对西方其它哲学流派的超越[J]. 理论导刊, 2011(4): 51-53.
- [2] 张光成. 从笛卡尔到马克思: 近代主观能动思想的承沿与新生[J]. 社会科学论坛, 2008(2 下): 16-19.
- [3] 笛卡尔. 第一哲学沉思集[M]. 庞景仁,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6.
- [4] 冯俊. 开启理性之门: 笛卡尔哲学研究[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 108.
- [5] 汤姆森. 笛卡尔[M]. 王军,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128.
- [6] 索雷尔. 笛卡尔[M]. 李永毅,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88.
- [7] 宋斌. 论笛卡尔的机械论哲学: 从形而上学与物理学的角度看[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 155.
- [8] 马克思.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10] 李猛. “一生一次”: 笛卡尔与现代形而上学的“新计划”[J]. 哲学研究, 2021(12): 90-100.
- [11] 郝长堉. 论“存在一个不欺骗的上帝”在笛卡尔哲学中的核心地位[J]. 哲学动态, 2021(11): 74-84.
- [12] 施璇. 笛卡尔的伦理学说研究[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21: 112.

- [13] 刘少明. 契合与超越: 马克思的实践理论与现象学原则的关系[J]. 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0(3): 11–20.
- [14] 梅洛-庞蒂. 知觉现象学[M]. 杨大春, 张尧均, 关群德,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27.
- [15] 高新民. 心灵与身体: 心灵哲学中的新二元论探微[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Marx's inheritance and modification of Descartes' "Theory of Physical Proper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henomenology

LIU Shaoming

(School of Marxism,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Descartes believed that the essence of things is extension, and the essence of the soul is thinking, therefore things have transcendence relative to thinking. However, the concept of innate talent can grasp the extension of things, making them recognizable, so things are the unity of transcendence and recognizability. Marx, based on the phenomenological theory of sensory activity, inherited and corrected the shortcomings of Descartes' theory. Firstly, Descartes' theory containe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heterogeneity and consistency of the mind and matter, while Marx constructed them on the basis of sensory activity, eliminat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Secondly, Descartes' theory relied on the external unity of faith and falls into the dilemma of infinite regression, while Marx revealed the mechanism of belief in the internal unity of phenomenological sensory activities, eliminating the infinite retreat dilemma of external unity. Thirdly, Descartes' theory was an abstract unity of sectionalization and statics, while Marx interpreted this unity in the context of survival, sociality, and historicity, making Descartes' theory more concrete and three-dimensional. Studying Marx's inheritance and revision of Descartes' theory of the unity of transcendence and recognizability of thing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understanding Descartes' and Marx's theories of things and their connections.

**Key words:** Theory of Physical Property; transcendence; cognizability; Descartes; Marx

[编辑: 胡兴华]